

Lun Yuwensuoan De
Tangdai shige Shi Yanji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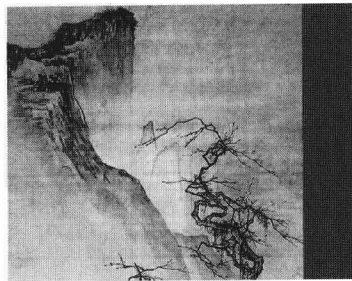
论宇文所安的 唐代诗歌史研究



陈小亮

著

Lun Yuwensuoan De
Tangdai shige Shi Yanjiu



论宇文所安的 唐代诗歌史研究

陈小亮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宇文所安的唐代诗歌史研究/陈小亮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7-5004-9018-0

I. ①论… II. ①陈… III. ①诗歌史—研究—中国—
唐代 IV. ①I207. 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2985 号

责任编辑 张 林 王 琪
责任校对 李 莉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6.75 插 页 2

字 数 240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陈小亮是我的博士生，2006年春入学。她浙江大学美学硕士毕业，从她的导师潘一禾教授和其他老师那里受到过很好的训练。当初小亮和我说，要选宇文所安的唐诗及其诗学研究为论文题目，我并不同意。宇文氏近若干年来在我国很热，关注的人很多，研究论文也颇不少了，搞得不好可能就是凑数。宇文氏的研究路向多变，甚至是不避自相矛盾的，这样的学术立场固然可以前后思想变化来作解，但变化的动机可能很复杂，我猜测和他偏好学术炫技有点关系。宇文氏的学术渊源也让我犯疑。

不过，我还是同意小亮的选题，因为她硕士期间搞的是西学，选一个有西方背景的汉学家来研究，有她的优势。更为重要的考虑在于，宇文氏是具有原创力的学者，有其值得研究之所在。宇文氏研究唐诗，确实有创获，让我钦服的是，他提出盛唐成熟的律诗是出于初唐的宫廷诗。搞文学史的人都知道，以往我们遵循群众史观，好像诗歌发展的活力都是来自民间下层，出于民间的诗歌就重视，出于宫廷的诗歌则评价不免负面，如对六朝的宫体诗往往否定居多。自然，宫廷诗不免被轻轻看过，但宇文氏却从此一以歌颂酬对为主的亚诗体发现了律诗的成长轨迹。此一看似纯技术的分析，却导致了诗学史研究的突破。律诗的研究汗牛充栋，怎么宇文氏就能说出些前人没有说过的话呢？看来，他之在我国学界受到尊重，并非出于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之类的崇洋心理。

至于宇文氏的学术渊源，我之起疑是他究竟在西方思想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来源？这个他自己是从来说的。有一次，我参加浙

江大学国际文化学系本科生的学士论文答辩，答辩者中有一位来自日本的留学生，他的论文题目是日本著名史学家内藤湖南的中国历史宋代近世说。这让我立刻联想到宇文氏的大作《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其间会不会有某种联系呢？我把此一想法告诉了小亮，让她去摸一下宇文氏的学术传承，果不其然，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曾经到日本留学一年，是清水茂（Shimizu Shigeru）的学生，并经常向唐诗专家吉川幸次郎求教。两人都属内藤湖南所在的京都学派。这样，他就极有可能吸收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因为历史的分期关系到学术史的走向，极为重要，宇文氏正是运用此一观点来引入现代的意识。在我的建议下，小亮的论文对宇文氏中国“中世纪”说与内藤湖南的中世说之联系作了细致、持平的分析，读者诸君不妨细读。而宇文氏绝口不提内藤湖南，倒是让人颇为费解。

小亮论文的外审意见我觉得比较公允，大意如下：

其一，是注重大叙事，即看研究对象的大处，有没有较大的发明，譬如宇文氏所谓“非虚构诗学”、“中唐新变论”、“同时代诗歌语境视角”等，都是抓得很准、得其要义的。论辩往还的结果，可以推进对文学史的新理解。

其二，在思想史的体与文学史的用之间，贯彻体用不二的诗学思想。这体现在作者对宇文氏所忽略的道禅思想传统的纠偏，有力地透过比较而推进了对诗学传统的认识。

其三，是对中国学术传统立场的强调。这是近年来学术界由于文化自觉而有意识加强的一种新风气。作者透过有理有据的细心发掘，彰显宇文氏思想深处的西学背景，这有助于我们更客观冷静地读宇文氏的著作。

这三条，固然是肯定了小亮的研究所运用方法的得当，不过，也可以从中看出学者们对宇文氏学术作评价时的某些倾向，即肯定之中，不主张对他盲目作好评、无端助长其学术强势，而是要看到他的学术的西方来源，他对中国古代诗歌所作的研究和评价是有其学术倾向性和局限性的。我很赞同这种全面、慎重的学术态度。

小亮的论文之所以出新，有两个原因。她具有细密严谨的分析能力，把握全局的功夫突出，论文平衡感很强，娓娓道来，渐渐服人，从不故作惊人的高论。还有，她的英文功底了得，可以流畅地阅读英文原典，宇文氏的晚唐诗研究专著《晚唐诗：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827—860）》（*The Late Tang: 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 (827—860)*）还没有翻译成中文，小亮读了他的英文原著，无疑给她的论文注入了新鲜感。

小亮的论文颇有一些让我意外之事。其一，在论文写作最紧张的一段时间，有一天她和我谈，最近被一起电话诈骗骗去万元。这是一个低级的骗术，小亮居然上当了。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自己也说不清，只是稀里糊涂地汇了钱。我们当然难以想象，一位智商如此之高的博士，竟会犯这等低级错误，如果不把此事解释为写论文出神了，还有什么更为妥帖的理由呢！

其二，小亮的论文送匿名外审竟然得了全优，五个评委一致给了高分。这在我的博士生论文评审中是第一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的胡晓明教授给我发来电邮，说有一篇博士论文送到他那里了，写得很不错，估计是我的学生，吩咐我让小亮把论文整理一部分，送给他所主编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发表。

其三，小亮的论文很快发生了影响。她的论文答辩是在2009年6月末，同年11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十六届年会上，就有人在大会发言中提到，张节末教授的学生已经做了宇文所安唐诗研究的题目，看来小亮的研究给了他深刻印象。会下亦有研究生来问我，你的学生做得不错，宇文所安是不是还能继续做？我回答是不必了。一则因为做的人多了，要有新意非常不容易的；二则因为小亮的论文一时难以超越。当然后面那句是没有说出口的。

这三件事，如果说第一件让我哑然失笑，那么第二件就给了我意外之喜，第三件则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好的学生会给老师带来什么。

此书在她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这本书出版以后，我想宇文先生会认真一读。相应于小亮的艰苦付出，此书得到国内同行的首

肯，也是可以乐观的。

小亮已经走出了可喜的一步，作为导师，愿她今后走得更远。谨作此序以为纪念。

张节末

2010年3月8日于杭州西溪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初盛唐诗与非虚构传统	(30)
第一节 初唐诗至盛唐诗的演进规律	(30)
一 陈子昂的历史地位	(30)
二 情感的复杂化	(39)
三 一时一意的写景方案	(43)
第二节 非虚构诗学与“类”	(49)
一 “类”的儒家道德主义取向及解释学证明	(49)
二 儒道之争:宇文所安与叶维廉的中国诗学 研究比较	(59)
第二章 现代性视阈下的中唐诗歌与诗学	(68)
第一节 古今之争:中唐诗对盛唐诗的反动	(68)
一 中唐枢纽论的历史源流	(69)
二 “中世纪终结”的思想来源	(77)
三 主体性的觉醒	(89)
第二节 园林诗	(102)
一 园林诗解读	(102)
二 别业诗传统	(109)
三 白居易的中隐与佛道思想	(113)
第三节 9世纪初期诗歌与写作之观念	(122)

2 / 论宇文所安的唐代诗歌史研究

一	9 世纪初期的两种创作理论	(122)
二	诗与经验的时间间隔与模拟理论	(124)
三	意外收获与境	(127)
四	“超摹仿”与“象外”	(131)
第三章 晚唐诗歌与诗学		(138)
第一节 9 世纪诗学与姚贾诗人群		(143)
一	9 世纪的职业诗人	(143)
二	为诗而作	(149)
三	五律诗律与佛教戒律的类比之误	(154)
四	精致对句	(169)
第二节 杜牧		(173)
一	不涉习俗	(173)
二	李贺序与少“理”	(180)
三	杜牧的双重角色:政治家与浪荡子	(186)
四	缺席之景与杜牧的田园诗	(192)
第三节 李商隐的隐秘诗与隐秘诗学		(205)
一	象征及诠释传统	(206)
二	隐秘诗学:游戏于新旧诗学之间	(213)
三	对诠释传统的颠覆	(217)
四	隐秘诗学的结构图式	(229)
结语 宇文所安唐诗研究的启示		(233)
参考文献		(239)

引 言

如何对中国文学传统再创造，恢复对传统的惊喜而又不失其本来面目，用新的解读和新的阐释来激活传统是极为重要的。在这方面，海外唐代诗歌研究已经引起我们的关注。这一领域集中了我国台港澳地区、日韩、欧美不同地域的众多优秀学者。就欧美的唐代诗歌研究成果而言，有不少是华裔学者完成的。尤其是刘若愚（James J. Y. Liu）的《中国诗歌艺术》（1962）、《李商隐的诗》（1969），对美国的唐代文学研究有草创之功。梅祖麟（Tsu-lin Mei）、高友工（Yu-kung Kao）用结构主义和语言学方法研究唐诗的意象、语义、结构，并与西方诗歌相比较，提出了许多富于启发的结论，在欧美的唐诗研究中独树一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诗的魅力》（1989）集结了他们的成果。此外还有叶嘉莹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1966）、程抱一（Francois Cheng，本名程纪贤）《唐代作家张若虚的诗歌作品之结构分析》（1970）和《中国诗的写作》（1977）、余宝琳（Pauline Yu）《王维诗歌》（1980）、李珍华《王昌龄》（1982）等。唐诗也是欧美学者对中国文学用功最勤的领域，集中了一批优秀学者，从老一辈学者傅汉思（Hans Frankel）到第二代学者斯蒂芬·欧文（Stephen Owen），都为唐代诗歌研究贡献了许多精彩的见解。他们的论著显示出丰富的文学史知识和良好的理论素养，其历史眼光的敏锐和观察问题角度的独特每每给人启发，这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学者论唐代文学》（1994）可以窥见一斑。^①其中，以斯蒂芬·欧文的唐诗研究成就最大。本书即选取这一唐诗研究

^① 参见蒋寅《20世纪海外唐代文学研究一瞥》，《求索》2001年第5期。

的中坚人物为研究对象。

斯蒂芬·欧文，中文名宇文所安，1946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1972年在耶鲁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学系获得博士学位，旋即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82年转至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任中国文学教授。1984年起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中国文学教授和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1997年起获任哈佛大学詹姆斯·布莱恩特·柯南德（James Bryant Conant）特级教授至今。^①从1975年出版博士论文《孟郊和韩愈的诗》^②以来，宇文所安的研究从作家研究推向诗歌史、诗学理论、文学史、文学理论的研究，其中以唐代诗歌史的整体研究最为卓著，《初唐诗》（1977）、《盛唐诗》（1980）、《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1996）、《晚唐诗》（2006）几乎将唐朝近三百年的诗歌史一网打尽。自20世纪80年代陆续译成中文（《晚唐诗》待出），在汉学界同时也在 中国汉语学界产生重大反响。他以人文学科特有的文本细读方法、开阔的文学史视角及犀利的观察、幽默的行文，为沉闷的传统学术研究带来更多思维的乐趣，对中国文学传统再创造及诗学重建提供了许多有益的认识和启发。

宇文所安关于文学史有自己的独到之见。在《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第一章《特性与独占》，谈到中唐诗人表现为否定性的特性、存在自觉与刻意的矛盾时，他认为，“文化史和文学史的历史分期最好是被当作一块块模板（matrices）来看待。这些模板不是由孤立的东西拼凑起来的，而是由相反或相对的概念与立场组成的套系（sets）。在模板当中，由另类概念与立场组成的亚套系（subsets）就构成所谓的‘问题’（issues），而每一次解决问题的努力

① 参见张宏生《对传统加以再创造，同时又不让它失真——访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斯蒂芬·欧文教授》，《文学遗产》1998年第1期。

② 即 *The Poetry of Meng Chiao and Han Yü*,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 孟欣欣中译本译为《韩愈和孟郊的诗歌》，本书取直译名《孟郊和韩愈的诗》，以下不再说明。

都似乎同时包含了相反或相对的概念与立场。但是这些问题并非孤立存在的；它们与其他问题相关联，有时是平行的，有时则在新的对立中化解成为某个单一概念。……这些相反相对的概念与立场，显示出一个时代的生机活力。它们最终会被忘却或得到解决，以新的常规话语或形象出现。这也许是界定一个时代的终结的方式之一”。于是“像‘内在的冲动’和‘刻意匠心’这两种对立的观念，当它们作为传统规范的对立面而存在时，它们之间的对立则化解了，形成了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立异独行的特性。……‘内在冲动’和‘艺术匠心’之间的对立，最后在作为‘艺术冲动的匠心’这一观念中得到合并。这一合并表现在‘苦吟’一词的演变中。‘苦吟’的原意是指出于痛苦而吟诗，然而到了九世纪的下半叶却转义为‘刻苦吟诗’。原先由于外在于文学的困苦而作诗，现在蜕变成了作诗本身的煞费苦心”^①。以此来理解中唐文学文化，“中唐以盛唐为基准和思想背景，来理解自己的知性文化。我们不能脱离中唐来孤立地看待盛唐”，“以往通过重复建立权威的文化，现在由一个通过发问建立权威的文化代替了”^②。这也是“中世纪”终结这一特定角度的题中之义。中唐文化就是在传统与特性、整体与碎片、公众价值与个人化诠释、严肃原则与琐细事物、有机诗学与技巧诗学、道德价值与浪漫文化的二元对立结构中展开。

我们姑且用“模板理论”称说这一见解，它不仅可用来解说中唐文学现象，也可推广至宇文所安早期《初唐诗》、《盛唐诗》的文学史写作。据他自己说，撰写《初唐诗》的初衷是“为盛唐诗的研究铺设背景”^③，我们不妨把初、盛唐诗放在一起研究。

“盛唐的律诗源于初唐的宫廷诗；盛唐的古风直接出自初唐诗人

① [美] 宇文所安：《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陈引驰、陈磊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0—21页。

② 同上书，第3页。

③ [美] 宇文所安：《初唐诗·序言》，贾晋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页。

陈子昂和七世纪的对立诗论；盛唐的七言歌行保留了许多武后朝流行的七言歌行的主题、类型联系及修辞惯例；咏物主题的各种惯例，送别诗的习见忧伤，及山水旅行诗的形式结构，这一切都植根于初唐诗。”^① 盛唐诗不仅以初唐诗为来源，而且可以看成是初唐诗的反动，盛唐诗歌之所以呈现出“直率”、“自然”这些特性，是“由于有七世纪诗歌作为比较的背景”^②。“如果初唐诗人为规范所限制，盛唐诗人就向往突破规范——包括文体方面的惯例和主题方面的狂士风度。如果宫廷诗人投入于贵族社会及其环境，盛唐诗人就将兴趣转向较低的社会阶层及其生活，从他们身上发现真正的高贵精神。如果宫廷诗人沾沾自喜于矫饰和拘谨的形式，盛唐诗人就喜好朴素和直率。如果初唐诗人轻视新奇的隐喻表达和巧妙结撰的文体，盛唐诗人就爱好它们。如果初唐诗人将诗歌看成基本上是社交现象，盛唐诗人就被引向个人价值和隐逸主题。”^③

不仅盛唐诗以初唐诗为背景和对立面，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初唐诗同样是由宫廷诗及其对立面构成。除却魏征、李百药的隋代对立诗论，王绩的诗歌也是对宫廷诗贵族的、世俗的荣耀的一种对立宣言：“如果他们的诗歌规范化，他就寻求自然朴素，如果他们对春天到来无动于衷，他就报以热烈的反应；如果他们喜欢物质世界的美，他就坚决地反对启动创造过程。他对宫廷诗的对立宣言可以表现为饮酒、田园风格、道家虚无主义，但是所有这些反应都可以定义为与宫廷诗及产生宫廷诗的贵族社会的否定关系。”^④ 尽管对立诗论在宫廷诗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对宫廷诗的真正改造却是从宫廷诗内部生发

① [美] 宇文所安：《盛唐诗》，贾晋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年版，第 4 页。

② [美] 宇文所安：《初唐诗》，贾晋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年版，第 2 页。

③ [美] 宇文所安：《盛唐诗》，贾晋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年版，第 4 页。

④ [美] 宇文所安：《初唐诗》，贾晋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年版，第 53 页。

的。“初唐诗比绝大多数诗歌更适合从文学史角度研究”^①，正在于“初唐诗的历史主要是这种诗歌旧世界被突破的历史”^②。宇文所安借用结构主义先驱、语言学家索绪尔首倡的一对概念即“语言/言语”，来阐发宫廷诗惯例、标准及法则和个别诗篇的矛盾关系。“句法的（结构的、句式的）和典范的（主题的、词汇的）诗歌法则都服务于同一目标，即限制诗人可用的选择……诗歌内部的动态联系产生了新的美学，这种美学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内在可能性，从而要求减少‘语言’的可能性以进行平衡。一首诗的兴趣和中心主要在于‘言语’，在于怎样把一部分与另一部分联系起来”，“结果导致七世纪后半叶、八世纪开头几十年‘语言’的扩充，逐渐破坏限制法则，最终将其打破。到了八世纪中期，‘语言’和个别诗篇的‘言语’在所关注的目标上达到了平衡”^③。由此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盛唐。

以上尽管在国内学者看来似乎过于绝对，但通过精心细读爬梳出的文学发展过程，较之我们文学史过于概略和笼统的说明，仍能给人以启发。尤为令人钦佩的是，宇文所安是一个对自己工作保持不断反省能力的学者。在后来的写作中，他常常拿自己早期的文学史写作进行批判性审察。他曾说：“在文学论著中，如果我们自己的思维习惯已经变得太轻快自如，那就很有必要脱离它们。文学论著所传达的不仅是一种认识的结构（例如，文学史的一种模式），而且还包括个别学者完成这一结构的途径：发现的兴奋，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在学术著作中，就像在文学作品本身一样，任何优秀的读者都能够辨别出作者从呆板的、学术的程式中获得的快乐。……但是，即使是最出色的认识结构，如果成了惯例和陈套，就会变得呆板乏味。脱离自己奠基获得的成果是十分可惜的，但又是必要的。”他强烈地感觉到诗歌

① [美] 宇文所安：《初唐诗》，贾晋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年版，第 2 页。

② [美] 宇文所安：《盛唐诗》，贾晋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年版，第 3 页。

③ [美] 宇文所安：《初唐诗》，贾晋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年版，第 326 页。

中那些无法为文学史所解释的方面，“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诗歌的某些方面具有中心的意义，而其他方面却黯淡无光。但是这些其他方面往往正是诗歌的‘诗歌’。文学史和我个人对它的描述也可能变成一种局限”。但他仍然相信文学史是基本的，“对于诗歌来说，文学史就像是‘门厅’，人们只有通过它才能到达诗歌；但是，它本身并不理解诗歌”^①。他一度将文学史的写作搁在一旁，继《初唐诗》、《盛唐诗》之后，他先后完成了《传统中国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兆》（1985）与《追忆》（1986）、《迷楼》（1989）的写作，由诗歌史转向诗歌理论，由文学史的系统处理转向非系统处理。正如宇文所安在《晚唐诗》中坦言，有数年时间，多次放弃又再次回到文学史写作。^②继1996年的《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六年之后，在《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中宇文所安对已有的包括他自己的文学史叙述框架重新进行了批判性审察。按照他的想法，原来一直觉得十分明确和稳定的时代、作品和作者都可能只是一些复杂的变化过程。文学史也“需要某种类似于从牛顿物理学到量子物理学的飞跃”^③。

他建议从三个层次对文学史进行审察：

第一个层次，我们应该首先确认在当前的文学研究实践里有哪些研究方式和信仰是司空见惯的，然后问一问这些研究习惯是否都是有效的工具。

第二个层次，我们应该把物质、文化和社会历史的想象加诸我们习以为常、确信不疑的事物。

第三个层次，在中国文学史里，无论是文本还是阶段的划分在多

① [美] 宇文所安：《初唐诗·序言》，贾晋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页。

② Stephen Owen, *The Late Tang: 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 (827-860)*, Cambridge and London: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p. 14.

③ [美] 宇文所安：《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Borrowed Stone: Selected Essays of Stephen Owen*），田晓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大程度上是被后来的历史过滤了的。而对前人进行过滤的后代文学史又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我们自己写作的文学史的一部分。^①

这种康德似的文学史批判将彻底改变本质主义的文学史书写。文学史不再是确定不疑的，而是变化的、不确定的、无规律可循的。这种对文学史的思考最终促成了《晚唐诗》的实践。

宇文所安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与研究热情，但国内学界对其中国文论研究的关注要远甚于其唐代诗歌史研究，而国外虽注重其诗歌史研究又局限于单部作品的评论，对于宇文所安的唐代诗歌史建构与诗学发明的整体研究尤显不足。基于此，我们首先对国内研究现状及国外研究作一综述，评析研究成果与不足，再联系本书的选题意图阐发本研究的对象、意义和方法。

第一节 国内研究现状

一 宇文所安的批评方法和批评特色

宇文所安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最早引起国内学界研究兴趣的是《追忆》。1993年发表在《读书》第7期的文敏的《不同文化的眼睛》^②，是国内第一篇关于宇文所安著作的评论，虽不足一页，却开了对宇文所安著作研究的先河，第一次对宇文所安在《追忆》中就李清照《金石录后序》的新颖解读给予了关注。1994年第6期《中国图书评论》刊登的何向阳的《重现的时光——读斯蒂芬·欧文〈追忆〉》^③又对《追忆》一书进行了总体评说。1996年《汉学研究》发表了程铁妞的《试论斯

① [美] 宇文所安：《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田晓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② 文敏：《不同文化的眼睛》，《读书》1993年第7期。

③ 何向阳：《重现的时光——读斯蒂芬·欧文〈追忆〉》，《中国图书评论》1994年第6期。

蒂芬·欧文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①，这是国内对宇文所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作整体研究的开山之作，该文主要立足《追忆》、《传统中国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兆》两本著作中的批评文本，分析作者的研究特色及方法论溯源，指出宇文所安作为外在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研究者给予相同文本不同意义的诠释的洞见与不见。其洞见主要体现于注重诗歌的内在结构、形式、互文性的分析，其不见主要体现为对文本之外的社会历史背景、文化内涵的忽略。程文第一次揭示了宇文所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新批评方法的应用，以及受新批评派影响视文本为批评出发点而带来的对历史、文化的不见，并总结出宇文所安受中国传统诗话影响，并糅合新批评与印象式批评，“随意性”的批评特色。这一批评特色在强调西方读者出于自身文化背景“读”的自由与中国文学传统考据式的阅读之间、诗话的随意性与西方文化主流的精心构设之间构成多重张力，并最终在两种文化碰撞中向其主体文化偏斜。以上种种无疑是宇文所安学术思想研究的精辟见解，对宇文所安的文学批评作出了全面总结并提出质疑，为进一步研究创造了良好基础。不足之处是，程文着眼于宇文所安的批评研究，着眼于“论”而非“史”的观念。这体现为程文所涉宇文所安论著主要为其批评论著，尤其是体现他研究特色的《追忆》与《传统中国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兆》，而不涉及《初唐诗》、《盛唐诗》诗歌史的著作。

二 宇文所安的唐代诗歌史研究

与对《追忆》较为浓厚的研究兴趣形成反差的是，国内学界对宇文所安唐代诗歌史研究的反应相对淡漠。《初唐诗》虽较《追忆》早三年即1987年出版中译本，并未引起国内学者应有的重视，除却《初唐诗·序言》中傅璇琮的褒奖：“宇文先生作于1977年的这本《初唐诗》，在中国学者之先对初唐诗歌做了整体的研究，并且从唐诗

^① 程铁妞：《试论斯蒂芬·欧文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载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一集，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年版，第227—260页。